

世運與學術



許倬雲院士於「慶祝史語所八十周年學術研討會」上演講情景（2008.10.22）

許倬雲

中央研究院院士

古今論衡 第 19 期 2009.6

【提要】

一個時代的文化，包括政治、經濟、思想等等合成的格局，常有與之相應的學術探討，以配合當時人士的思考。中國歷史上，有秦漢大帝國的規模，即有相應的著作，是規模宏大的結構。東漢學術則相應於虛誕的讖緯術數，即有恢復原典面貌的訓詁之學。宋代朱子之學，因為正統立說，有相應的嚴整秩序。明代王學則是其反動，而清代樸學，又是王學的反動。民國以來，相應於中國在列國體制中的位置，以史語所創辦之初，其學術取向，即是「界定中國」，以置中國於歐洲啓蒙以來的「現代」。二十世紀後半，「現代」已在衰變。人類文明正在進入樞軸時代的第二次突破，遂重新組合為全球化的經濟與政治，和科技文明。與這一「後現代」取向相應，我們應當「界定世界」及陳述「人」的現象，作為學術工作的新課題。

❖ 大綱

I. 解題：世運與學術的相應

世運：一個時代的綜合情況

學術：以理性探索的心智活動

II. 歷史上的前例

秦漢大帝國的時代與宏大知識系統

東漢的回歸經典

朱子學與陽明學，及清代的樸學

III. 中國近代學術的特性

歐洲啓蒙時代的新秩序（現代）與學術

二十世紀前期，「界定中國」的努力

IV. 二十世紀後半的世界

「現代」的衰變與全球化科技革命

人類文明的第二次突破

新文明帶來的課題

V. 我們面對的新時代

「人」與「己」的界定

從「界定自己」，轉向「界定世界」

陳述「人」的故事，以界定「人」的現象

I. 解題：世運與學術的相應

先界定題目：「世運」並不是術數家陽九、百六所說的時運，而是指涉一個時代文化、社會、經濟，諸元合成的形態。「學術」，意指我們理性探索的努力。今天，則以史語所所慶的場合，專指與史語所工作範圍內的有關學科，又因為我的專業是史學，凡所取譬，也以史學為主。

一個時代的文化總相，即是當時人生活的環境，在這一網絡下，當時人會由環境發展，提出一些是他們關心的問題，也因此從事相應的探索，以此尋求答案，或者提供合理性的解釋。

II. 歷史上的前例

我們可以秦漢帝國的早期為例，秦統一六國，漢初一切帝國秩序次第開展，逐漸形成一個「普世天下」的規模。在這一時期，《呂氏春秋》、《淮南子》，甚至《史記》，都提出了上及天文，下及地理，中間人事系列的宏大結構，而董仲舒的龐大理論系統，更是以一個多維諸元互相感應的網絡。凡此都反映了建構大帝國時的心態。

到了東漢，物極必反，龐大複雜的理論系統，漸漸遠離理性，淪於虛誕，甚至讖緯術數大行其道。於是東漢學者，另闢學術探討的方向，從事訓詁之學，撥亂而返於經學的正道。這一努力，後世稱之為「漢學」的傳統，淨化了，也純化了儒家經典的原貌，相對而言，則放棄了義理之學。終於又以老莊及新入中國的釋氏之學，填補了遺留的空間。

類似的情形，則是清代的樸學傳統興起的背景。宋代世道，乃是由唐代的開張，轉化為內斂。朱子之學，總結了北宋的成績，組織為包羅一切的理學系統，凝聚經學為一個堅實的結構。物質堅實之極則是結為晶體，例如鑽石即是碳分子的結晶體，卻也失去了可以變動調節的空間。這一理論系統對於解釋一個穩定的結構，十分有用：而明清兩代的專制帝國，正要這樣一個保守的理論，支持其不容許改變的權力結構。明代後半段的陽明之學，主張個人內心的主體性，當可認為是對於外在結構強力約束的反動。王學肆漫，走了另一個極端，於是清代樸學，正如東漢學風一樣，進行了又一次淨化，志在回到經典的原貌。這一學風，又一次以訓詁為主流，擠下了義理之學，甚至「辭章」，也沒有多少發展的空間。

Ⅲ. 中國近代學術的特性

近代學風，正是在這一背景下，另有一番轉折。近代轉變最重要的現象，即是西學東漸，也可說是「全球化」現象的端始。歐洲學術是當時西學的主流，歐洲在宗教改革與啓蒙時代的大轉變，開啓了此後數百年的學術趨勢。那一段時代，歐洲的許多族群，尤其中歐的日爾曼族群，累積了大洋航道開啓以來，由西班牙、葡萄牙轉輸的大量財富，已逐漸發展為堅厚的經濟力量，他們長久受制於教廷的信仰及「神聖羅馬帝國」封建的雙重桎梏，於是他們建構了民族國家、城市經濟、自由思想……，形成一個延伸至今的另一次「世運」（現代）。因此，探討語言的譜系，研究傳說與故事，發掘文獻與考古的過去，都是為了界定族群，建立民族的認同。戰爭與外交、土地與商業檔案，則以世俗的歷史，代替了教會的歷史解釋。哲學的討論，以「理性」的邏輯為基礎，代替了神學。終於，現代科學逐漸形成全新的學術主流，其影響之巨大深遠，無可倫比。今天我們還是身處這一「現代」，卻已走到其叔季之期。

當上一個世紀之初，為了面對新世道，早已有王觀堂、梁任公等人，為中國的新學術，開啓新方向。史語所創所的前輩，傅斯年、陳寅恪諸位先生，大都留學德國，接受了當時歐洲學術的啓發。當時中國的老大帝國，正如「蜥蜴的殘夢」，不再能夠面對「民族國家」的列國體制，傅先生創所時設計的四個學科，歷史、語言、考古、民族四組，毋寧反映了十九世紀德國學術關懷的幾個重要項目，也是為了「界定中國」。而且，德國的實證學風，頗可銜接清代樸學的謹嚴傳統。

不過，中國究竟不是歐洲，中國主要的族群，經過長期的涵化，已是高度同質性的「漢族」。於是，民族學的研究，在中國的發展，是析出少數族群，為他們重建認同。方言的研究，則是完成了方言群的譜系及方言演變的過程。考古學的成就確認了文獻以外的文化發展過程。史學方面，經兩代學者的努力，中國的歷史，尤其典章制度的研究，為中國政治及經濟，各個時期的變化，勾勒出清楚的面貌——凡此，都是中國尋求世界定位的時代需求，的確可稱為「界定中國」的努力。史語所的學術群，不但確立了研究的方法，也規劃了課題，即是為中國定位，也描述了中國文化的長程演化，使重新界定的中國進入西方之導的「現代」，至少有了「自知」之明。

現在史語所已是第三代了，為了世界的世道，也從潛移默化，漸漸加快步伐，正在進入另一個階段。歐洲啓蒙時代開創的「現代」，正在逐漸蛻變，全球化、資訊革命、生命科學……都在改變世界。兩個世紀以來，一些視為當然的制度，例如主權國家、工業生產、資本主義、民主政治……都在急速的改變。在上一個世紀的前半段，

馬克斯理論與韋伯理論，都是針對「資本主義」而起各持一端。在二十世紀的後半期，韋伯理論則已轉變為分析社會與經濟結構的方法學，以理性假設與比較研究，分析複雜組織的結構與其間的關係。這一變化，竟可認為是人文社會學科在方法學之統一。接下去，史學園地又呈現法國年鑑學派的影響，則是對於複雜組織中，選取某一項目，全盤由微見著，從個案表面的細部解析與陳述，在穩定長程中，找到聯接各項因素的中程變化。於是，史學觀察，既顧及全局，也注意了局部，尤其其中常被忽略的個人及其心態。

IV. 二十世紀後半的世界

在人文社會學科，「後現代」的研討角度，為過去長期被忽視的婦女、窮人、殖民地人民……諸種弱者，找回公道。這一趨勢，也是相應於「現代」文化逐漸由強者與上層擴散到全民的大勢。不久的將來，新的「世運」將逐漸浮現。大家關心的課題，將與二十世紀的課題不同。

我們可以設想：全球化的趨勢，將使「國家」與「族群」觀念，發生根本性的改變。但是，「全球化」未必是「世界大同」。全球合為一之前，必然會經過大區域的整合。而在目前的「國家」弱化時，地方主義或本土主義也趁潮而起。於是，「國家」將面對兩個趨勢的拉扯。另一方面，今天崛起的大國，和可能在明天才興起的新興國家，又難免強調國家本位。因此，「全球化」並不是一條直路，其發展過程，將十分迂迴曲折。

最近全球經濟危機，已觸及我們的日常生活。二百多年來，工業生產與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，不斷提高了一般人的生活水準，也迅速的消耗了地球上種種資源。全球化的金融流動網，在經濟不斷擴大時，以錢玩錢，更刺激了貪慾。資本主義的基石是信用，在信用不見時，資本主義也將瓦解。而「上帝已死」，諸神隱退，再也沒有約束人心貪慾的力量。人類迅速消費種種資源；總有一天，做大餅已沒有做得更大的材料，成長已走到極限。今天視為當然的，增加生產與擴大經濟，將逼我們改變想法，重新想到如何合理的共用與分配。這一課題，勢將包括：哪一個層次的群體，是合理共用的單位？哪一種方式可以合理的組織群體與管理群體公眾事務？哪些權利必須屬於個人？哪些權力，個人可以委託群體？這一連串的問號，意味著我們必須認真的思考，再一次界定人類共同生活的許多價值觀念。

兩千多年前，若干文化系統的先賢先哲，界定了不同文化系統的價值觀念。幾百年來，西方的猶太——希臘——基督教系統獨擅勝場，排擠了中國、印度、伊斯蘭諸文化系統。今天，上述幾個大系統，正在各自界定了不同的「現代」。當這些不同的「現代」碰撞時，孰是孰非？我們面臨許多內容各異的價值觀，我們不禁四顧茫然。

在「後現代化」的潮流中，一向被擠壓置於邊緣與底層的弱者，已紛紛發出不平之鳴，他們在建構另一套價值觀，第一步是否定原來屬於優勢上層的價值觀。於是，價值觀的多元造成了迷茫之外，我們又多了一層決裂與揚棄。我們不能在一個沒有起碼共識的情況下，共同生活於地球而不起衝突。（今天的「恐怖行動」，即是這一情況下的產物。）因此，我們須面對的課題，必然有一個是建構一套判斷是非對錯的新價值觀。

生命科學的進展，已將許多生命現象，從生物化學的角度討論（例如分子、基因等等）。生命已可以由人工合成。生命的意義，一向為人類尋索的重大課題，其神秘性，是所有宗教信仰的基礎。生命科學正在為生命解密，但是生命的終極意義何在？仍是我們生活中必須面對的大事。開啓現代的歐洲啓蒙時代，宗教改革純化了基督教信仰，於是天賦人權、自然定律……都以「神」為保證，甚至推動資本主義的動機，也是回應「神」的思想與「神」賦予的使命。今天，我們已不能從基督教信仰為基礎的西方文化中，找到可與生命科學相容的解答。物理學與外太空的探索，也將我們的宇宙觀帶進新的境界。我們勢必還須在西方以外的其他文化中尋找，俾得轉化為新的闡釋。

二十世紀，科技進展，突飛猛進，今天，知識（主要指科技知識）是商品，也是財富與權力。一方面，大多數國家重視教育，又有網絡上的知識擴散，知識已不是少數上層菁英的專有。另一方面，最高層次的研究與學習，不但耗資極大，而又必須有相當人數的學術社群，庶能在切磋與競爭中，不斷突破未知與已知的邊界。今天全球只有數得出的幾個大中心，聚集了大量學術人口，許多突破，幾乎都在這些中心發生；是以，知識又不是均衡的分配於各處。同時，畢竟求知的活動，受個人智慧的制約，也不能要求「眾生平等」。但是，擁有知識可以獲得財富與權力，人類社會豈不又有了地位的差異與不公？

以上這些問題，正在逼人而來，我們不能不早日綢繆，著手在學術研究與教育中，將這些問題納入考慮之列。雅斯培曾以為人類的第二次樞軸文明的突破，將是進入一個科技文明。上述諸項課題，可說都與這一突破有所關聯。在二十世紀，有

過許多應用這些發展而起的觀念，也有過實踐的嘗試：社會主義、國家主義、無政府主義、自然主義……，新政、共產制度、福利國家……，同時，聯合國、歐盟、WTO……形形色色，不可枚舉。至今，我們自己的學術界經常居於被動，隨潮逐流，不能以自己擁有的文化資源，參與各種對話。

V. 我們面對的新時代

史語所八十年來，一代一代，都有所更張。第一代前輩的課題，已如前述。在我與陶晉生、蕭啟慶這一代，曾經將史學探討，從政治制度及上層思想轉入社會與經濟的變化。在杜正勝與現在許多同仁手上，又擴展領域，內向進入心靈與生命史，外向進入環境與科技史。另一方面，臺灣進入歷史，是全球化現象的一個路標。臺灣的歷史本身，在不同時期各有其獨特的國際意義。本所同仁也注意於臺灣考古和臺灣社會的研究，已有可觀的成績。五十年來，史語所還是臺灣的主力軍，引領風騷，帶動風氣。下一步呢？我個人盼望，大家從「中國史」的範圍，擴大及於他處，將「界定自己」轉化為「界定他人」與「界定世界」，將「中國」、「本土」置於「世界」之內，而不是與「世界」對立。畢竟，單元與更大的單元間，應是辯證式不斷擴大的延伸，經過接觸、交流，以致融合，在不同的階段，「自」與「他」之間，有不同程度的相對關係；最後，一切單元均將融入「世界」。我們一向將中國文化及本土地區當作自足的單位，進行種種研究。最近幾年，史語所延聘了研究其他文化與國家的同仁，這一發展，意味我們已在改弦更張。

我盼望，大家不是從個別文化系統與國家民族，作歷史研究。更須研究文化之間的種種交流與碰撞。也更須帶入比較研究；比較研究，實是韋伯研究方法的主要部分，超越國家與個別文化的研究，則又是布羅岱「地中海」研究的主軸。從史語所開始，我們何嘗不能再次引領風騷，帶動各地華語社會的研究，庶幾集合各處的學術成果，為今後世界的新文化，提出一個西方文化為主要觀點的另一視野？我期許史語所的同仁們，當仁不讓，義不容辭，擔起這重大的任務，從「人」的現象，陳述「人」的故事。耶和華的故事與奧林比亞的故事，已不足以涵蓋各處人類的情況。我們提出的新視野，正如雙目比獨眼有更好的縱深，會有助於建構人類文明的偉大事業。

許久以前，有一本書 *Brave New World*，中文譯名是「美麗的新世界」，這一書中，預測了許多可能出現的未來世界，其中有些情節，確實正在發生。Brave，兼具

華美與勇決兩個意義。在這人類新文明逼近之際，如果我們不能斷然決裂，將未來的決定權，操之於己，我們將不能創造一個美好的新秩序。我們下一步的學術，必須從「界定自己」，提昇為「界定人類」。或者，更直接的表達：以陳述「人」的故事，界定「人」的現象。

（編按：本文為「慶祝史語所八十周年學術研討會」主題演講）